

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

张小明

【摘要】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最为典型的非西方大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国际秩序指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秩序，而世界秩序包含国际秩序、国内秩序以及跨国秩序，但迄今为止世界秩序的核心在于国际秩序，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是 21 世纪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变迁的动力之一，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动力。

【关键词】 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世界秩序

【作者简介】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xmzhang@pku.edu.cn。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World Order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is the most typical example of the rise of non-Western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der is the order among the sovereign states, and the world order includes international order, domestic order, and transnational order, but at the core of the world order i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dominated the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orders since the Westphalian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US has been the dominant country in the so-cal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other non-Western powers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ey words: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order, world order

Author: Zhang Xiaomi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重要和深刻的变

革,有关中国与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的关系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①。相关主题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国到底是现存(全球与地区层次)秩序的维护者还是挑战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文作者无意也无力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这一主题。但是,本文作者试图通过解读“中国崛起”、“国际秩序”以及“世界秩序”等相关概念的含义,来阐释和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以及将要发生的变化。

何谓中国崛起?

虽然中国崛起是21世纪初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中国崛起”(the rise of China or China's rise)并非21世纪初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实际上它至少在二战期间就已经开始被使用了。^②然而这个概念被学界广为使用,却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情,即从美国学者威廉·奥弗霍尔特在1993年出版题为《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这本书开始。^③随后,中国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并出版了相关著述。^④如果说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一些西方人士质疑

^① 光是相关研究著作的数量就很多,其中包括: Ramgopal Agarwala, *The Rise of China: Threat or Opportunity?*, New Delhi: Bookwell, 2002;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Ted C. Fishman, *China Inc.: The Relentless Rise of the Next Great Superpower*,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05; Ian Storey, *ASEAN and the Rise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6;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William W. K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 ed.,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V.P. Malik and Jorg Schultz, eds., *The Rise of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Asia and Europe*,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008; Minqi Li,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Rex Li, *A Rising China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Security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2008; C. Fred Bergsten, et al, *China's Ri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nd Cheng-yi Lin,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09; Brantly Womack, ed.,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Herbert S. Yee, ed., *China's Rise: Threat or Opportunity?*, London: Routledge, 2011; Arne Odd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London: Bodley Head, 2012; 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Gary J. Schmitt, *The Rise of China: Essays on the Future Competition*, Encounter Books, 2013;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 [俄]米·季塔连科、弗·彼得罗夫斯基著:《俄罗斯、中国与世界秩序》,栗瑞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② 笔者查到过多本分别出版于1941年、1943年、1959年、1962年、1964年、1970年、1989年英文著作的书名中包含“中国崛起”这个概念: Chiang, May-ling Soong, *China Shall Rise Again*, London: Hurst & Blackett, Ltd., 1941; William F. Burbidge, *Rising China: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 and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Generalissimo and Madame Chiang Kai-Shek*, London, 1943; Arthur Doak Barnett, *Communist Economic Strategy: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59; Victor Purcell,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Wayne Ayres Wilcox, *India, Pakistan and the Rise of China*, New York: Walker, 1964;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Irwin Millard Heine, *China's Rise to Commercial Maritime Power*, New York: Green Wood, 1989.

^③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3. 该书的中文版于1996年出版: [美]威廉·奥弗霍尔特著:《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达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虽然奥弗霍尔特并非最早使用“中国崛起”这个词的人,但是可能正是他的这个本书引发了冷战以后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以及“中国崛起”这一概念的流行。

^④ 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的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有关中国崛起的论点的话^⑤，那么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崛起为大国则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学者、评论家和政治家的广泛共识了。^⑥ 甚至有西方学者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两国集团”(G2)等吸睛的概念，以此诠释中国实力的极大增强。^⑦ 还有西方学者出版了以《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西方的衰落》等为题目的著作。^⑧ 有人明确指出，21 世纪初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已经从一个国际社会的边缘角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显赫角色。^⑨ 特别是自从 2003 年以来，随着中国知识精英和国家领导人公开阐述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更是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时尚，甚至中国人提出的“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这个概念本身，也成为某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研讨的对象。^⑩ 一位欧洲学者甚至这样写道：“今天欧洲的所有人都在观察中国，大家无论是否了解中国，都对中国有看法。”

¹¹ 实际上，西方媒体报道亦是如此。正如一位学者在书中所写道的：“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被媒体报道最多的事件，不是全球金融危机，不是经年累月的伊拉克战争，甚至也不是‘9.11’恐怖袭击，而是中国的崛起”。¹²

虽然中国崛起在 21 世纪初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崛起只是 21 世纪初的现象。实际上，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3 年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具有完全主权地位的国家，它在 1945 年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国共内战以及 1949 年以后新中国长期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和历经多次政治动荡，中国的崛起过程如果不能说是被中断的话，至少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阻碍。中国真正被认为开始步入在国际社会中崛起的过程，应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 年到 2007 年，中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9.8%，比世界经济同期发展水平高 6.8 个百分点，超过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经济起飞时的记录。在 200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

^⑤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5 (1999), pp. 24-36.

^⑥ Samuel S. Kim,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in Barry Buzan and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Gerald Segal*,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40.

^⑦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10, Issue 3, 2007, pp.215-239;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l? Think A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2007; Fred C.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87, Issue 4, July 1st, 2008, pp.57-69.

^⑧ [英] 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版；[英] 尼尔·弗格森著：《西方的衰落》，米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

^⑨ 赵可金：“中国地位与世界角色—探索新外交哲学”，《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50 页。

^⑩ Bonnie S. Glaser and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 Making in China: Then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China Quarterly*, Vol. 190 (June 2007), pp. 291-310.

¹¹ Ingrid d'Hooghe, "The Limits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Puzzle",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Diplomacy Papers No.25*, 2010, p.1

¹² [澳] 潘成鑫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张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前言》第 1 页。

到 9.59533 万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约合 1.15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¹³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05 年超过英国，在 2007 年超过德国。到了 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上升到 5.8786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¹⁴ 中国的快速崛起无疑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但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实际上，中国在科学技术、国防现代化以及国际角色等诸多方面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今天的中国依然处于崛起的过程之中，或者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之中的大国，它面临着很多和很大的内外挑战。¹⁵ 虽然有某些中国学者预测，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¹⁶，或者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仅次于美国的“名副其实的配角”¹⁷，但是更多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采取谨慎评估的态度，并否认中国将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¹⁸

中国崛起之所以在 21 世纪初成为如此引入瞩目的现象，除了中国实力快速增长之外，更在于中国的特殊性，即中国是 21 世纪初在现代国际社会群体性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因为它属于一个“非西方性”最为明显的新兴大国。

众所周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发源于欧洲，后来逐渐扩展到全世界，成为全球性的国际社会，西方国家一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主导者，是国际规范的主要制定者、修订者、传播者以及裁决者，而非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后来者，一直是国际规范接受者或者抵制者。然而，国际社会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也为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这是因为，随着非西方国家加入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广大的原先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地位并加入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中的非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这在联合国成员国组成中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尽管非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还是相对比较弱小的，20 世纪 50-60 年代兴起的第三世界主要是被视为“反抗西方”的重要势力，西方国家依然维持着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所谓“金砖国家”的实力的快速增长，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群体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对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这些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不满足于只当国际规范的接受者，

¹³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Nov/233921.htm>，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

¹⁴ “GDP 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1-02-14/085921950289.s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

¹⁵ 张蕴岭：《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前言》第 2-3 页；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¹⁶ 阎学通著：《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 页。

¹⁷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18 页。

¹⁸ 王缉思编：《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3 页。

也希望参与新的国际规范的制定。正因为如此，在21世纪初有学者提出西方霸权是否行将终结的问题。¹⁹ 本文作者认为，现在谈西方霸权的终结还为时过早，所谓非西方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或者不结盟运动一样，远没有（也不太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影响巨大的单一行为体。但是，非西方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群体性崛起的确是21世纪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中国可能是一个最为特殊和典型的个案。众所周知，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一直在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摇摆不定，而印度、巴西、南非都曾经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其在语言、价值观等文化属性方面深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中，只有中国的“非西方性”最为纯粹，它在21世纪希望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意愿大概也是最强烈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中国来说，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有利时期。中国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内忧外患，富裕、强大和获取国际尊重似乎即将到来。中国人在精神上重新获得自信，很多人认为国运正在往上走，该是中国宣称自己‘天命所归’的时候了。”²⁰ 也正是因为中国此种特殊性，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快速崛起的中国相对来说更为容易被视为一个另类国家或者“挑战者”、“修正主义国家”，并被加以防范和制约。对于中国来说，如何以行动和言语让西方国家相信自己不是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修正主义国家”，则始终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中国智慧”？）。

国际秩序是否为世界秩序的核心？

“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两个概念往往被加以混用。虽然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它们被混用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二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因此，解读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实属必要。

秩序是人们常用的词汇，但界定它并不容易，有关秩序的理解总是存在着争议。²¹ 何谓秩序？秩序（order）与无秩序（disorder）相对立，指一系列事物或现象出于某种目的和按照某种规则的有序排列。赫德利·布尔说道：“说一些放在一起的东西显得有秩序，其最简单和通常的含义是，这些东西按照某种格局（pattern）而相互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意性的，而是基于某个明确

¹⁹ [英] 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第38页；庞中英：“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1期，第53页；[英] 巴里·布赞：“全球性变革与国际秩序的演进”，《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17-18页。

²⁰ 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6版），计秋枫、朱庆葆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596页。

²¹ [美] 小约瑟夫·奈、[加] 戴维·韦尔奇著：《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十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0页。

的原则。因此，书架上的一排书是有秩序的，而地板上的一堆书则是无秩序的。”²² 也就是说，秩序的建立在有赖于共同追求的目标或共同利益，因为秩序是一种旨在追求社会生活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与此同时，秩序的维持也有赖于规则的存在，包括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以及使得这些规则得以发挥效力的制度。在布尔看来，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作用以及战争等等都是国际社会的有效制度，使得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得以存在和维持，但国际组织只是“假制度”，虽然国际组织在维持秩序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并不是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²³ 共同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无疑有助于秩序的维持，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

国际秩序，即“国家间的秩序”²⁴，或者“国际社会内部的秩序”²⁵一般指近代以来至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秩序，正如有的学者所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的国际秩序，或者“威斯特伐利亚秩序”²⁶。当然，国际秩序也可以指所有类型的国家之间的秩序，即除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之外，还包括前现代国家之间的秩序。国际秩序无疑属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国家中心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布尔就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²⁷ 约翰·艾肯伯里把 1945 年以后主要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称之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²⁸ 问题在于，如何界定“自由主义的”？阿米塔·阿查亚质疑该秩序的自由主义性质，因为自由主义秩序只存在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属于这个范畴。²⁹ 另外，今天此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遭受的挑战是否主要来自美国政治变化和相对实力变化本身？有学者在讨论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危机并走向终结的时候就提到了美国因素。2016 年 11 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持这种看法的人明显增多。比如，阿米塔·阿查亚就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虽然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但特朗普胜选在多个方面挑战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复合世界”正在来临。³⁰ 但是，他同时又认为，中国一直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这一秩序的崩溃会让其损失巨大，因此中国将不

²² [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 年版，第 7 页。

²³ 同上书，第 2-4 页。

²⁴ 同上书，第 21 页。

²⁵ 同上书，第 22 页。

²⁶ 王赓武：“当今世界秩序是好的秩序吗？”，《外交评论》，2015 年第 6 期，第 11-14 页。

²⁷ [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第 11 页。

²⁸ John Ikenbu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John Ikenbury,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John Ikenbu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²⁹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6 期，第 14-25 页。

³⁰ [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6 期，第 14-25 页。

会允许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突然崩溃。³¹ 另一方面,很多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把中国的崛起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或威胁,因为中国被视为一个非自由民主国家。比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冷战后不久就预言,“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³² 他进一步指出,“……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³³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³⁴

与国际秩序不同的是,世界秩序则是指“整个人类大社会的秩序”³⁵,它的内涵无疑比国家间的秩序或者国际秩序更为广泛,实际上既包含国家之间的秩序或国际社会内部的秩序,也包括国家内部的国内秩序,还包含众多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构建的秩序或跨国秩序等等。因此,世界秩序研究属于世界政治研究范畴,国家中心主义色彩相对较弱。

也就是说,国际秩序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参与秩序构建的行为体类型和数量的不同。参与国际秩序构建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数量相对较少,而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主要行为体,除了国家之外,还有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数量相对较多。此外,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即构建国际秩序的行为体—国家只是历史的产物,不是永存的,而作为世界秩序终极单位的个人却是永存的、不会消失的(除非地球毁灭)。正因为如此,布尔就认为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根本,这是由于人类大社会的终极单位(ultimate units)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部族、帝国、阶级或政党,而是个人。个人是永存的、不会消失的,而人类的这种或那种集合形式则并非如此。现在是国际关系的时代,然而今后不管全球政治或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一直都会存在着。”³⁶ 在本文作者看来,到底是世界秩序更重要,还是国际秩序更重要,这更多属于价值判断问题。

然而,“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两个概念却常常被混用,因为两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亨利·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一书中,就反复混用这两个概念,并且始终没有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界定。³⁷ 其实,我认为,这两个概念被混用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一直都是世界政治中的最主要的行为体,其地位高于个人,世界秩序是否存在的最关键因素,正是

³¹ 同上注。

³²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

³³ 同上书,第204-205页。

³⁴ 同上书,第297页。

³⁵ 同上书,第21页。

³⁶ 同上书,第22页。

³⁷ [美]亨利·基辛格著:《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

在于国家之间的秩序是否存在。也就是说，至少是从近代以来，正是因为存在着国际秩序，所以世界秩序才得以维持。或者说，国际秩序是世界秩序的一块坚实的基石或者核心。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重点论述的实际上是均势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其演变，认为维持均势是国际秩序得以稳定的最可靠方法，因此其世界秩序研究实际上更接近国际秩序研究。他认为，在当今世界，霸权变得非常难以接受，包含着政治不正确，这就使得均势可能成为建立或维持秩序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路径。³⁸ 在基辛格看来，革命是危害国际秩序的主要危险，是对现存秩序合法性的挑战，即当“一个体系中一个或一些主要权力体不接受（国际秩序的）基本安排或其他国家国内制度”³⁹时，这个体系就处于被革命状态。赫德利·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一书中，则使用“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一词，认为世界政治中之所以存在着秩序，就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即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它基于一系列的规则、规范与制度。也就是说，布尔首要关注的对象，实际上也是国际秩序问题。在布尔学生、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安德鲁·赫里尔看来，布尔坚持认为，一个弱的（thin）、多元的国际社会是维护世界秩序之最佳方式。⁴⁰ 但是冷战结束后，有英国学派学者提出，世界政治可能正在发生着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的转变，因为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在增强。⁴¹ 尽管如此，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被非国家行为体所取代或者共享的状态，国际秩序依然是我们首要关注的对象。

总之，虽然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它们经常被加以混用，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至今，国际秩序的存在是世界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础，或者说西方主导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始终是世界秩序的核心。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世界秩序的变迁

如前所述，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最为典型的非西方大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国际秩序指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秩序，而世界秩序包含国际秩序、国内秩序以及跨国秩序，但迄今为止世界秩序的核心在于国际秩序，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

21世纪初，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迁，表现在权力结构变化、规范变迁等多个方面，尽管主权国家之间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并没有被超越。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

³⁸ Henry Kissinger, "We live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Daedalus*, Vol. 124, No. 3, The Quest for World Order (Summer, 1995), p. 102.

³⁹ Henry Kissinger, "Reflections on America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35, No. 1 (Oct., 1956), p. 43.

⁴⁰ [英]安德鲁·赫里尔：“第四版序言”，[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第II页。

⁴¹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崛起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动力，并且受到格外关注。原因在于这些非西方国家有自己的秩序观，其中中国传统秩序观的非西方性最为典型，也最为被关注。

古代中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世界秩序观（天下观）以及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主要是其他东亚国家）关系的规范和制度（朝贡体系或朝贡制度），它被有的学者视为真正的世界秩序观，有别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观。⁴² 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对外关系理念极大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行为，并且在近代以后面临着以主权平等为核心原则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的巨大冲击，中国从此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念，接受了源于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念。⁴³

问题在于，近代以后，中国是否已经完全放弃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解读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⁴⁴ 也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向来将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地区的关系视为国内地区间关系的延伸，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式处理与其它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数千年贯穿、维系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规范、法则和模式，其思想、经验和历史遗存（包括正反两方面）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战略和东亚区域的格局与秩序。”⁴⁵ 还有学者明确指出，“仅仅从晚清和 20 世纪初中国身份构建的历史实践已经可以看出后世民族主义革命的端倪：民族主义是中国政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一种动员力量，并不是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或终极关怀。存于中国之心的，仍然是对天下的关怀。在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迷雾中，民族主义只是那条龙的爪子。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从‘天下’到‘（基于民族主义的）世界’的观念转变。”⁴⁶

在赵汀阳看来，我们可以使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现代化，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⁴⁷ 他还提出了“新天下体系”的设想，即“天下体系就是意在化天道为人道之大业。周公设计的分封制度，即天下一体分治体系，是政治史上一项开创性的制度实验。尽管尚未充分表达天下理念，却是天下体系的唯

⁴²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赵汀阳：《天下的当地性：世界秩序的实践和想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版；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韩]金容九著：《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之法》，权赫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王赓武：“当今世界秩序是好的秩序吗？”，《外交评论》，2015 年第 6 期。

⁴³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2 页。

⁴⁴ [美]约瑟夫·R. 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7 页。

⁴⁵ 杨倩如：“双重视野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研究—在中外关系史与国际政治学之间”，《当代亚太》，2013 年第 2 期，第 48 页。

⁴⁶ 李扬帆：《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第 797 页。

⁴⁷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 3 页。

一实验，其制度设计之得失，对于未来可能的新天下体系是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⁴⁸ 张启雄认为，在当今，对中西国际秩序及原理的探寻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实力的增强将带来更大的影响力与更艰巨的责任，而整合国际秩序的问题也将接踵而至。因此，他提出，今天应该寻找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原理，即“中华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融合西方历史文化价值所形成的国际法秩序原理，弥补国际法之不足，从而形成更适合于规范“东西国际体系”之国际秩序的“全球国际秩序原理”。⁴⁹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不少。⁵⁰ 比如许纪霖认为，传统的天下主义可以在现代性的脉络中予以扬弃和更新，发展成为新天下主义，或者天下主义 2.0 版。用他的话说就是：“新天下主义的所谓‘新’，乃是加入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在新天下秩序之中，没有中心，只有相互尊重独立和平等的民族与国家，也不再具有支配与奴役、保护与臣服的等级性权力安排，而是去权力、去宰制的平等相处的和平秩序。更重要的乃是新天下秩序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没有华夏与蛮夷之分，不再有主体与客体之分，诚如古人所云‘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⁵¹ 值得指出的是，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和赵汀阳的新天下主义有不同之处，前者加入主权国家平等原则，而后者则视等级制为社会运作之所需。用赵汀阳的话来说就是，“周朝的天下分封制度建构了一个网住世界大地之‘地网’，一个有等级结构的网络体系。即使以今日眼光视之，天下体系的网络性仍然具有当代性甚至未来性，但其等级结构却不符合今日世界之价值观，很容易被视为一个支配结构。然而，取消等级的社会至今仍然是个缺乏实践条件的理想。不仅古代社会都是等级制的，今天的世界在实质上也是等级制的。这说明，尽管等级制有悖平等之价值，却仍然是社会运作之所需。价值观有价值观的道理，现实有现实的道理。”⁵²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天下秩序不具有普世性意义，它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矛盾和冲突，因此不可能重新恢复儒家天下秩序。⁵³ 甚至学者对天下观倡导者源于当今中国崛起的现实及其政策需要之目的提出质疑。⁵⁴

本文作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国际秩序观，但是其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没有也不可能从中国的对外关系理念中完全消失，依然还在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这

⁴⁸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69 页。

⁴⁹ 常宇鑫：“迎接挑战，回归中华秩序原理——访近代史研究学者张启雄”，《北京大学校报》，2014 年 11 月 17 日，第 4 版。

⁵⁰ 于春松：《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⁵¹ 许纪霖：《家国天下一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41 页。

⁵²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第 69-70 页。

⁵³ 王庆新：“儒家王道思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外交评论》，2016 年第 3 期，第 73-99 页。

⁵⁴ [美]柯岚安 (William A. Callahan)：“中国视野下的世界秩序：天下、帝国和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10 期，第 49-56 页。

种影响可能是近代以后中国与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当然此种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程度大小以及表现形式的不同。在21世纪，西方国家普遍把正在崛起的中国视为现存秩序的挑战，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此。然而，天下观本质上属于前现代的世界秩序观，而非现代的国际秩序观，除非现代主权国家消亡，否则不太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中国自身也已经接受和捍卫源于欧洲的主权规范。实际上，另外也有东亚邻国学者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在今天已经行不通的观点：“近代之后的世界是国家之间的‘国际社会’，而传统的中华秩序的内在原理是否认‘国际社会’本身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考虑如何克服这种缺点反而强调重新利用中华秩序，这在全球，哪怕是在东亚邻国也是行不通的。”⁵⁵

当然，除了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之外，今天以及未来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变迁的动力还有很多，比如科学技术（如核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革命）的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恐怖主义者和跨国难民）的作用上升以及主要西方大国内外政策的调整等等中，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其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的冲击都是很大的。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系列不走寻常路的内外政策更让世界进入一个极为不稳定、不确定的时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自身，而不是中国，正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

⁵⁵ 王元周主编：《中华秩序的理想、事实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